



原创

文学穿越现实专辑

第 6 辑

吴 炫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文化理论原创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创

文学穿越现实专辑

第 6 辑

吴 炫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文化理论原创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创:文学穿越现实专辑.第6辑/吴炫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2017.5重印)

ISBN 978-7-5161-9188-0

I. ①原… II. ①吴…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734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罗莉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2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356千字
定价 8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文学穿越论

吴炫	文学对观念现实的穿越	3
吴炫	文学对生活现实的穿越	34
吴炫	文学对文学现实的穿越	67

文学穿越论评价

杨春时	文学性与现代性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引发的理论问题	97
王乾坤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定位	107
牛学智	“文学穿越论”与“个性化管理” ——吴炫的文学批评理论	116
孙雁冰	影响与穿越 ——哈罗德·布鲁姆与吴炫文学观之比较	129

学者穿越实践

胡克俭等	从贾宝玉形象看《红楼梦》的经典性	137
肖峰旭	《金瓶梅》妻妾群像典型与否定主义美学	144
蒋虹	否定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 ——“好色”之独象与“女尊”之独创	150
赖翅萍	对现实与既定艺术规范的双重否定 ——论魏明伦创作的个体创造性	170

王 东	论金庸的“个体化世界”	182
郑民等	归来:一个穿越历史现实的意象 ——论电影《归来》中美学意象的独创性	191
马海英	本我的陈后主和玉树后庭花	199

研究生穿越实践

左君宜	走向绝路的爱情 ——评析《嫌疑犯 X 的献身》中对爱的探讨	209
范中亚	论《游仙窟》对欲望现实的尊重	218
贾 佳	从日剧《昼颜》看欲望情感穿越问题	227
余庆月	《娇娜》:对情感现实的穿越	232
赵 洋	孤独的彼岸 ——浅谈《百年孤独》对孤独的情感穿越	238
蔡逸冰	浅谈文学尊重欲望	245
宋美伦	《道林格雷的画像》之否定主义美学探索	251
陆冬晓	苹果是如何创造产品的? ——读《“再问人何以能”——中西经典思想 批判讲演录》	257
陆冬晓	iOS7 真的是扁平化吗,还是更加拟物化了? ——iOS 变革背后的哲学研究	260

网络世界穿越实践

老家村口	当代旧体词的创作势态	267
子 贺	中国陶瓷材料美学的权利扩张	274

会议综述

陈成吒	中国式文学史理论建构 ——“文学性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史”高层学术 论坛综述	281
-----	--	-----

**附录 创造资源**

李文儒	“文化战争”与艺术创新 ——与吴冠中对话	289
-----	-------------------------------	-----

吴少海	创造力就是看见力 ——兼论“意识的反思性结构”与笛卡尔的方法论 问答部分(上)	300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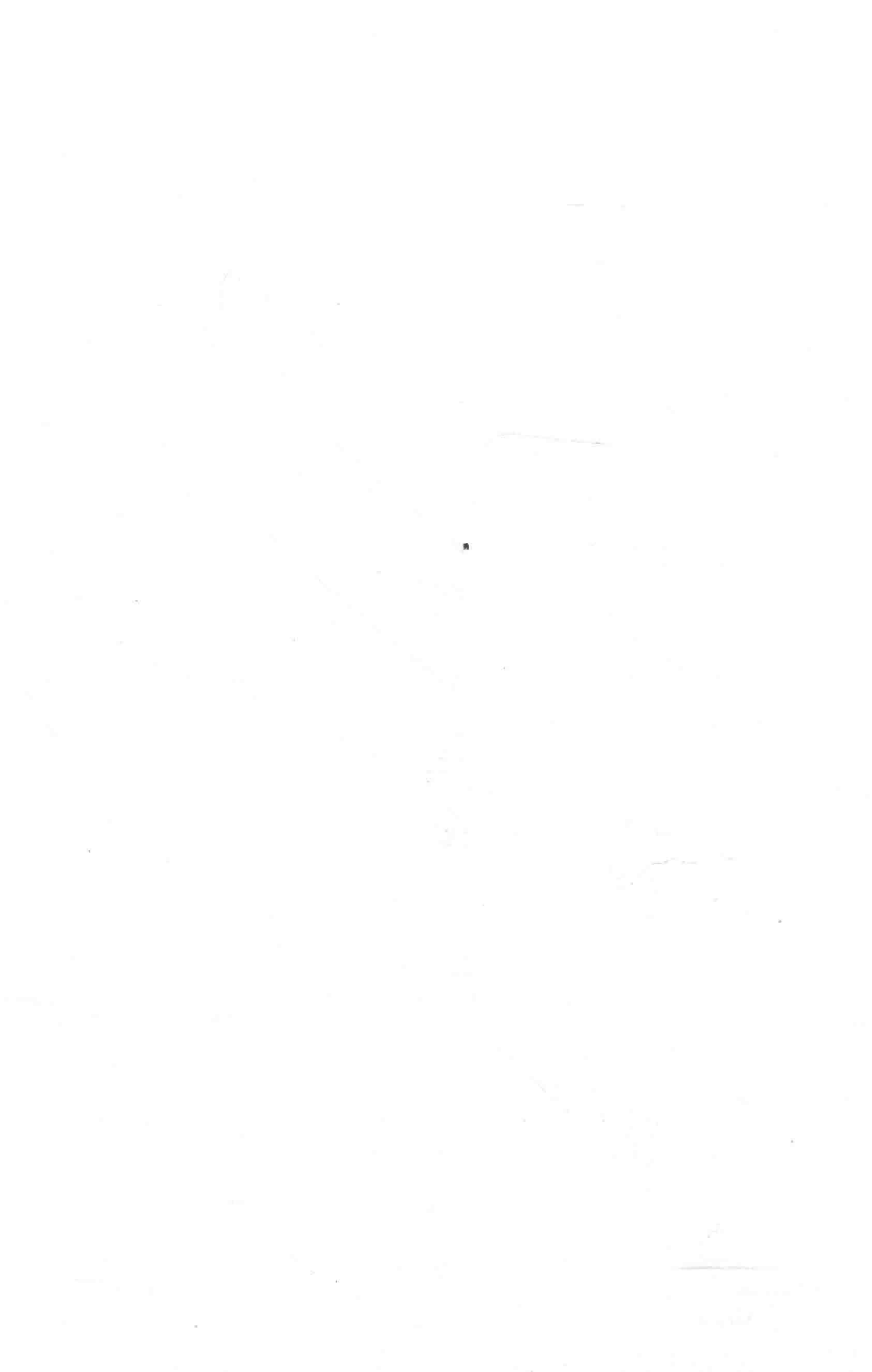
张曼菱	致北大学子:让生命冲破牢笼	304
-----	---------------------	-----

李桂奎	“中国写人学”构建的理据与理路	317
-----	-----------------------	-----

《原创》约稿函	337
---------------	-----

文学穿越论





文学对观念现实的穿越

一 文与道：百年中国文论的流变及问题

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缠绕中国学者和作家一个多世纪的重要话题。这个话题迄今尚未过时的原因在于：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家建构的各种文艺理论，我认为均没有在观念和理论上解决中国文学如何既保持中国文化的“整体性”、“通透性”特质，又区别“文以载道”工具性生存的问题。因为要具备中国文化特性，就需要区别于西方以“二元对立”思维为前提的关于文学的理解方式，其核心在于谈文学本体和文学独立的时候，绝不能从诸如对立社会现实内容的“艺术即形式”、“纯文学”、“自律论”上手，也不能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对抗理性现实”的“批判美学”上手，因为前者很容易用对象化思维将“文学性”视为一种“有确定文学边界”的存在，从而破坏中国文化所讲的整体性，后者容易导致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大众的“对立”、“对抗”状态，从而违背中国人文所讲的人与世界的亲和性。另外，我们又要警惕这种“整体性”思维使得我们不自觉地将“儒家仁爱之道”转换为“西方文化之道”但却不去改变“顺从、服务文化和时代之道”的工具化性质，尤其需要警惕选择、认同一种“道”并且只是对这种“道”进行个性化的、与时俱进的阐释所造成的“低程度文学创新”之状况，从而开启什么是“文学的高程度创新”之新途径，并把“高程度”和“低程度”之关系纳入“中国式当代文学观”建设的思考。

在中国文论史上，“文”是主要作为文化经典之“道”的延伸物来

看待的。刘勰的《原道》《宗经》作为《文心雕龙》的纲领性内容，其“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道、圣、文的顺延与承接之关系，不仅为后人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产生了将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看成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①的文学服务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因为经济和制度在根本上是文化的产物——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不大去思考为什么中国文化同样曾经造就了古代强大的盛唐时代之问题——由文化落后的看法自然也引发了对儒家文化经典批判的实践，因为文学是文化的枝节，所以中国古典戏曲、律诗、文言文均被视为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文化的符号而遭到厌弃，从而开启了视西方文化经典为“新圣”，视西方电影、小说、话剧为新文化体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严复的历史进化论传播经过胡适的文学进化论阐发，最后形成今天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分类，这里隐含的“统一现代”并且以西方文化发展为参照的进化思路，成为判断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总体价值坐标。这一坐标在解释中国文学“文变染乎世情”的文学与时俱进方面是有效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也由此走向了一条对世界开放的、与西方文论接轨的发展道路，其意义在于中国现代文论不再故步自封而以世界和天下为单位思考自己的现代化问题。在这条总体价值取向的感召下，王国维的叔本华生命哲学、鲁迅之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周作人基于西方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当代文学家钱谷融重新提出的“文学是人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人道主义大讨论，都是其产物。

然而一个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也被这样的文艺理论现代化遮蔽了：《文心雕龙》直接面对的文学问题即是儒家影响力在齐梁时代的衰弱而导致文坛“矫讹翻浅”、“楚艳汉侈”之文学创作问题，其目的在于“还宗经诰”、“正末归本”，而中国现代文艺理论面对的同样是儒家文化衰落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和文学问题。按理说中国现代文论本来可以趁西方文化的影响机缘对《文心雕龙》的“宗经”思维产生根本性的“批判与创造”的理论实践，然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急于将西方的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人的观念在中国布道，这种布道看似是对儒家经典的批判和挑战，但由于“征圣”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结果，一旦西方之道难以落实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中国文学就还是会回到中国文化对文学的规定中——王国维后期转为“经学”研究，文学为抗战服务、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文学为改革服务等“载道”文学观重新出现就是很好的说明。本来，文学顺应文化现代化要求表现西方文化观念，对文学来说就像表现传统文化观念一样正常，但文学自身的问题却不能停留在顺应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之道上，而应该在“文对道既顺应更突破”中来展开“中国文学何以独立”之问题的思考，如此才能真正与讲究生命力、创造力和反思力的现代性接轨。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去看也很简单，《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既不体现在儒、道、释等文化思想上，鲁迅《伤逝》的艺术魅力和启发性也不体现在对西方个性解放之道的遵从上，这说明优秀的文学是以突破文化之道、进而模糊文化之道为己任的。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看到文学反对封建之道又依附西方文化之道的怪圈，将文学自身独特的、启示性的、丰富的“意蕴世界”看成与中西方文化之“道”是有突破性张力的关系来探索，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就会注意到鲁迅的《伤逝》展现出的那种“表层内容赞同个性解放、深层内容质疑个性解放”的意蕴张力和意蕴层次，从中提炼“文”与“道”的新的中国思路——鲁迅的“虚妄”既是对传统之道的突破也是对西方之道的突破，并且因此也可以发现《红楼梦》是既尊重更突破儒家之道、尊重更突破道家 and 道教之道从而才找到文学魅力的立身之本的。遗憾的是，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胡适的“文学进化论”等开始，一直到“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形式论”、“生命论”、“解构论”、“反本质主义”，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百年来在基本原理上均上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思路与原理，只能与这样的中国文学独立的问题注定擦肩而过。如此，中国现代文论在解释中国近百年文学走向现代化但经典作品既不能与古代“四大名著”媲美，也不能与20世纪西方文学经典媲美的问题上，就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当然就会影响到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品格。

另一方面应该说，从王国维引进康德的“主客体”思维探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始，到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用“主体—客体”、

“本质—现象”、“反映—被反映”的认识论思维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论”、“方法论”、“本质论”和21世纪的“反本质主义”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基本受制于西方文论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和话语的制约。这种制约的长处是：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通过西方文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疏离传统经验论和感悟性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通过“本质论”的文学理解突破传统文论工具性的文学观——“文以载道”，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通过“艺术即形式”的西方文学本体论的倡导、“纯文学”概念的使用，对促进中国文学由王国维开始就追问的“超功利”性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艺术即形式”的新潮文论最后偃旗息鼓，但这对提醒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要建立中国式的文学本体论，仍然是有桥梁意义的。特别是有学者依据马克思、黑格尔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审美意识形态”，通过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样机械僵化的文学观，文学理论自身的审美语境才可以因此而建立。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不管“意识形态”、“反映论”、“形式论”在多大程度上已出中国文化特性之左右，即便在知识论意义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参照西方理论来完成自己的建构，应该说也是中国文论融入西方文论构成共同对话场域的前提。

但想提醒的问题是：西方理论家之所以要质问中国的“新左派”为什么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说话而不建立自己的理论在中国说话，要害就是想说理论从来没有世界通行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便在西方影响很大，到了现代也仍然要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对“劳动异化”问题的改造以及马克思基本观念范畴的改造，各自提出的不同的如“非同一性”、“感性生命”、“星丛”等才能对当代的“理性异化”问题产生影响。所以中国当代文论工作者用“本质”和“反本质主义”来讨论文学理解问题，用“主体”与“客体”来讨论作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用“对抗、拒绝社会内容”的“纯文学”来讨论中国先锋文学，从而使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中国文化特性”——“生生”、“根与叶”之整体性、有机性、通透性性质——也同样处在被遮蔽的状态，自然也就不可能提出由中国文化特性显示出来的独特的文艺理论问题。

在哲学上这意味着，《易经》八卦S图所显示的阴阳渗透之整体性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性，这种特性使得中国文论对文学的理解从来就是非本质性的、非边界性的、非实体性的、非确定性的，一如张少康、刘三富所说的“主张言志、载道的偏向主理一派……主张缘情、抒写性灵的偏向主情一派”^①，即“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偏向程度”的差异构成中国式文学理解的特点。清人王夫之提出“曲写心灵”^②自然是针对“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说教性诗歌风尚提出文学问题的，然“兴观群怨”的强调说明王夫之依然没有将儒家之理作为对立面。所以“缘情说”作为不同于“载道说”的主张，不是渗透了儒家的亲情等人伦之理，就是渗透了道家的自然情趣之理，在根本上中国文论“情”与“理”的较量实际上只是不同的“理”在较量——成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说的也是“心”和“情”与“理”的密切关系。如果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写的是道家美学的“恬淡”闲情而不是“真性情”，那么建安七子的“狂放”同样也不能理解为“真性情”，而是被儒家礼义所挤压又被道家超脱所释放的一种文化性情感，郭沫若的《天狗》抒发的就更是西方现代生命美学的生命激情。既然“情”与“理”无法真正分离，所以“载道”与“缘情”都不能确立文学与非文学的真正边界，也不可能确立文学实体性的本质。如果“五四”以后的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在“情”与“理”的关系上就应该提出这样的文学问题：既然“情”总是渗透了各种文化性的“理”，所以文学要依赖“情”来保持文学与文化的区别，便只能依靠作家个体化理解的“理”来规定“情”的独特品格，这正如贾宝玉的“真情”既不是“纯情”也不是“性爱之情”而是很难被文化观念所概括的一种“特殊之情”一样，这样的“情”才是构成文学区别于各种现实文化观念之所在。如此，“独特理解的情”与“共同理解的情”才可能构成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现代性问题”，并由此完成对传统文论“情”与“理”之争的现代思维方式和提问题方式的转折。以此类推，如果中国文化讲

①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 71.

② 原载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

究“源”与“流”、“根”与“叶”之有机整体关系的意义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所重视，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文体、创作方法和技巧作为叶应该派生于怎样的根与道”的问题，就会同样作为一个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被提出，用“西方之器盛中国传统之道”或用“中国传统之器盛西方之道”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问题就可以被有效地纠正；如果我们意识到白话小说的语言问题在根本上是我们缺乏中国式现代化之“道”作为文学的“根”，意识到引进西方创作方法或进行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如果离开“道”的创造必然失败，意识到“意识流”在乔伊斯那里不仅是创作手法而且也是世界观……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可能就会是另一番格局。

二 为何是“文以穿道”？

由此，我提出“文以穿道”文学观来代替“文以载道”文学观，就不是用一个完全无关于“文以载道”的西方式文学观为原理基础来进行中国当代文学观建设，更不是从传统文论中发掘诸如“缘情说”那样的概念来做现代阐释，而是针对“文以载道”的“文学依附性局限”通过改造“文对道的单纯承载”关系，达到“尊重道和改造道的统一”，使当代中国文学观既可以与“现代性”的“自由”、“疏离”的本质内涵打通，也可以落实在古今中国文学经典的“独创性经验”上。

具体来说，不管西方理论界多数学者是把“现代性”理解为“自由”与“合理性”，还是像吉登斯在现代制度层面上将现代性的性质理解为“脱域”（disembedding）、“时空分离”、“反思性”^①，抑或是像哈耶克那样将自由主义理解为相对于“人造的秩序”（a made order）那样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②，“尊重个体权利的制度理性”、“尊重个体生命力的非理性”、“尊重个体创造力的超越理性”，可以理解为是贯穿“现代性”各种理解的一些基本内容。而且，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②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 71.

这些基本内容不仅是从西方理论家的言论中传达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从西方现代体制、生活现实和文化成果中体现出来的。无论是现代经济制度对个人自由竞争和私人财产的保护，还是现代政治制度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以“个体”为单位思考社会的各种关系，应该是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而“个体”的“生命”所包含的潜意识、性冲动、感性经验以及哈耶克所说的“非理性设计”的“自发”和“无知”，不仅是突破“高于生命的理性”的力量，导致尼采的“价值重估”、柏格森的“生命意志”和伊格尔顿的“反本质主义”，而且也产生了使吉登斯的“反思性”得以可能的对人的创造力的推崇，使得20世纪西方各种思潮、观念和主义因为这样的创造性而“林立”之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虽然对个体权利、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推崇使得西方传统理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得全球和谐安宁的理想在这种冲击下离我们更加遥远，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要有效地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优势对今天的世界发挥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以尊重个体生命力、亲和个体创造力的姿态进入全球现代性的共同生活，然后才谈得上建立中国式的重视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东方文化之魅力的问题。即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种“仅仅是理论上的存在”或“调节心灵的存在”而非“可干预现实”的存在，原因就在于“不尊重生命力”、“漠视创造力”的儒家文化，无法告诉人们在“生命力”、“创造力”已被唤起的今天，除了“节制欲望”和“淡泊欲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新的途径给人以启示，也无法告诉我们在世俗享乐满足后人还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因此，在肯定“欲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世界的平衡与和谐关系，才是一个中国可影响东亚，也可影响西方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原创课题。重视这样的课题，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就有一个从“承载”东西方“观念之道”的生存状态，转变为依靠文学的文学性力量突破各种“观念之道”从而履行“文学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之使命。最为重要的是，文学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仅应该衔接上传统借“缘情”来反抗“礼教”的血脉，突出中国人情感中蕴含的生命力，而且在“情理统一”的意义上，还必须将这样的突破落实在作家自己对世界的“道”之理解的基础上，“生命力”对“既定的理”之突破和“创造力”对“个体化之理”的建构才可以

得到统一，突破既定的“理”之“生命力”才可以在作家“创造自己的理”中得以安放，从而改变“情在而理亡”但“情又没有独立的力量可以抗衡理”的汤显祖式的悲剧状态，也才可以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情理统一”命题转变为“普遍的情受个体化的理支配”之新命题。

不仅如此，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观体现“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还必须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有没有自己的“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展现的文化经验入手，才能发现“个体”、“生命力”、“创造力”在中国文学中存在的方式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样的经验可以打通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内容，那么中国文学观的现代性就不是一个凭空产生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上述经验没有得到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论充分揭示的理论盲点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着，从王国维借叔本华哲学写《红楼梦评论》开始，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就踏上了一条简单依托西方文学理论评点中国文学而与中国经验不同程度脱节的批评之路。无论是王国维的“生命哲学”，还是周作人基于西方人道主义理解的“文学是人学”，抑或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即形式”和90年代后的“文学解构论”、“反本质主义”等等，都存在着无视中国文学的文化特点以及“中国式的个体、生命力、独创性存在方式”的问题。这种无视的结果，一方面使得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化经验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使得像“形式论”、“解构论”这样的文学观无法切入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个体化理解世界的贫困”之问题，另一方面又不能对中国当代文学观进行具有“尊重载道又能突破载道”的文化整体性原创思考，书面上西方各种文学观走马灯与现实中“载各种道的文学创作”的分裂性存在，自然使得中国作家、研究生和大学生对文艺理论失去兴趣。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学是压抑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是缺乏个体独立品格的，那么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的创作是不是也可以被这种压抑所说明？如果可以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就是一种与现代性基本无关的原因造成的，中国文学告别传统经验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合理的推论；如果很难说明，中国古代优秀作家和作品就应该蕴藏着中国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实现的经验，深入研究《易传》的“生

生”、姚鼐的“阳刚阴柔”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这些“以风格概念显示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论也注意到个性差异和风格差异等“个性化”问题，然而由于“载道”、“宗经”思维造成作品在深层意蕴上存在着“类型化”、“从众化”的理解世界之现象，这就使作家不自觉地会在创作实践中产生完全遵守、有限遵守以及突破儒、道、释观念的“程度差异”之问题，并最终造成了像可以被儒家文化概括的杜甫和儒、道、释均难以简单概括的苏轼的“独创性差异”之现象。所谓“独创性差异”，不仅是指作家“风格差异”、“语言差异”等体验和表现方式的差异，而且是指作家理解世界的差异——这是一种依附道、选择道还是改造道、化解道进而进入“独特的道之体验世界”的差异。这种“意蕴差异”体现为作家受“儒”、“道”、“释”观念制约的“强与弱”。这种独创性的“强与弱”由于依托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还可以获得一种中国文化上的“统一又不统一”的价值张力现象支撑。即表现在政治哲学上，会产生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保持各自民族习惯、信仰和理解世界上可以统一于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表现在生活哲学上会产生中国人“表里不一”的行为方式和处世方式，表现在文学评价上也同样会产生一些中国文人社会地位高但人格和作品评价却不一定高之现象……忽略这样的“强与弱”之张力性整体关系在“中国式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就会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只能在西方文学之道间转换的现代史，也必然至今也解决不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非文学性—教化性”之顽症，理论上也就不可能回答中国现代优秀文学与世界一流作品的独创性差异究竟在哪里这一“中国当代文学问题”。

于是，由现代性所呼唤的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统一而成的独创性追求和中国文化艺术所提供的整体性、渗透性经验，就共同催生出“文以穿道”中的“穿”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性。一是“穿”是“穿越”的意思，是以“穿过对象”为其性质的，这就使得它不以“打倒对象”、“轻视对象”、“抛弃对象”、“拒绝对象”为前提，所以明显区别于儒家“膜拜—拒斥”思维所形成的“反传统”、“轻视世俗”、“告别80年代”等否定性概念。“穿越”以“尊重穿越对象并由此与穿越